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盡弃其舊以從人也
新民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
二曰采補其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
吾所謂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風者流
蔑弃吾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以求伍於他人
亦非如墨守故紙者流
謂僅抱此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遂足以立於大地也
啓超一介書生手無寸鐵捨口誅筆伐外何能爲役
且明知樊籠之下言出禍隨
徒以義之所在不能有所憚而安於緘默
抑天下固多風骨之士又安見不有聞吾言而興者也



中国近代思想者丛书

新民时代

——梁启超文选

侯宜杰 / 选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新民时代

梁启超文选



中国近代思想者丛书

侯宜杰 选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代:梁启超文选/侯宜杰选注.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中国近代思想者丛书)

ISBN 7-5306-2800-3

I. 新… II. 侯… III. 梁启超(1873~1929) — 文集 IV. B25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54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2 字数 227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7.00 元

内 容 提 要

梁启超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戊戌变法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分子之一。他以毕生精力,努力探索改造中国社会、扭转落后局面、富国强民、振兴中华的道路。变法失败后,他顺应历史潮流,反对封建帝制,反对君主立宪,借鉴西方的思想和政体,结合当时国情,大声疾呼实行开明专制。他博学多识,在政治、经济、司法、教育、历史、哲学、新闻出版、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均有卓越建树,并创造了“新文体”,成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驱。本书所收,系梁启超著作的精华部分。每篇文章均有题解和注释。本书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及其发展,对他多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探讨。

编辑前言

近代中国的历史，写满了耻辱。伴随着西方列强炮舰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国土被瓜分，主权被剥夺，民族尊严丧失殆尽，大量白银和无数珍贵文物流向海外；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生凋敝，生灵涂炭，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危机。

近代中国的历史，也充满着希望。即使观念最为保守的顽固派，也不再否认这一不争的事实：中国已经落后了。而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人欺辱。中国人第一次睁开眼睛向外看世界。众多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欲挽狂澜于既倒的有识之士，纷纷将目光投向西方，寻求疗治社会痼疾、摆脱民族危亡、富国强兵、解民倒悬的妙药丹方，掀起了持久的出国留学、越洋考察和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热潮，出现了一个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局面。长期被封建制度和传统观念束缚的思想得到解放，进化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制夷”、“共和”、“立宪”等各种思潮，以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再造民魂等各种主张竞相纷呈，划破了神州上空阴霾密布、黑暗沉闷的夜幕，重新点燃了民族振

兴的希望之光。

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当前,刚刚摆脱沉重的历史羁绊的中华民族,正以空前迅速的步伐,进一步走向改革开放,创造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新时代。尽管当前的国内政治局面、经济状况和国际环境与鸦片战争后的国内外形势已大不相同,但我们的科学技术、经济实力、文化教育、国防军事以及国民素质、文明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国际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严峻的挑战,也并不比应付当年列强的枪炮来得轻松。落后便要受制于人,更谈不到真正的民族尊严。因此,认真吸取、借鉴前人向西方学习的经验教训,深入开发、充分利用这一丰厚的历史遗产,是完全必要的,人们可以从中获得启迪,少走弯路,使改革开放的步伐走得更快更稳。

为此,我们策划并编辑了这套“中国近代思想者丛书”。本丛书选择中国近代史上曾在各个领域发挥重大作用、产生过重要影响,或在某些方面成就卓著的人士,将最能体现其思想、代表其成就的文章、作品编为一集,人各一书。每书的前言,对其思想、主张、历史作用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客观的评价。为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每篇(组)文章均通过题解介绍其背景、主旨、作用和影响。为省却读者翻检之劳,克服语言障碍,还对文中的历史典故、人名地名、有关事件、年代、风俗等语词和引文加以尽量详尽、准确的注释。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获得读者的认可;同时,更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对本丛书存在的问题给予直率的批评指正。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1 年 10 月

前 言

侯宜杰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人称任公先生,1873年2月23日诞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ní)子乡茶坑村的一个中农家庭。祖父是个秀才,父亲未有功名。幼年跟从祖父和父亲学习,聪颖异常,10岁有“神童”之名。1887年肄业于广州学海堂,次年转为正班生,同时又为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的院外生。1889年参加广东乡试,考中举人,名列第八。1890年春入京会试,不第。同年秋,拜康有为为师,请康有为开馆讲学于万木草堂。1892年参加会试,又落第而归。此后乡居一年有馀。1893年冬,讲学于东莞。1895年再入京会试,依然名落孙山。适此时清政府战败,与日本议和,签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梁启超积极参加“公车上书”,请求变法。后在京协助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强学会。1896年4月离京赴上海,8月,《时务报》创刊,任主笔。1897年参与创办不缠足会、大同译书局、女学堂。11月,因与总理汪康年发生矛盾,离开《时务报》,到长沙时务学堂就任中文总教习。1898年2月到上海就医,病愈后入

都。4月,协助康有为创设保国会。7月3日,被锐意改革的光绪皇帝召见,赏六品衔,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21日,慈禧太后出面“训政”,维新运动失败。当日晚,梁启超避入日本使馆,旋逃亡日本。12月23日,在横滨创刊《清议报》(旬刊)。1899年8月,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12月,前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募集捐款,筹划自立军起事,准备武装“勤王”。1900年7月一度归国,不久,自立军起事失败,乃取道印度转赴澳洲。居澳半年,返回日本横滨。1902年2月8日,创刊《新民丛报》(半月刊)。11月14日,又创办文艺月刊《新小说》。1903年2月前往北美,3月抵加拿大温哥华,5月抵美国纽约。12月返日本。1904年4月,秘密赴上海筹办《时报》。1907年10月,创刊《政论》(月刊),组织立宪团体政闻社。1910年2月20日,创办《国风报》(旬刊)。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曾秘密前往大连、沈阳,不久返回日本。1912年9月回国。12月1日,创办《庸言》杂志(半月刊)。1913年2月加入共和党。5月进步党成立,任理事。9月11日,出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1914年2月熊希龄内阁倒台,梁启超被任命为币制局总裁。6月,兼任参政会参政员。12月,辞去币制局总裁职务。1915年1月,被聘为《大中华》杂志总撰述。2月,由京移居天津。12月赴沪,参加护国战争。1916年3月转赴广西。5月1日,任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都参谋。8日,任护国军军务院抚军兼政务委员长。30日,闻父死讯,辞去各职,居丧守制。1917年1月入京。7月1日,参与讨伐张勋复辟。同月17日,出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11月15日随段内阁辞职。后在天津从事著述。1918年12月底由上海乘轮前往欧洲游历,至1920年3月返抵北京。从此放弃政治活动,全力从事于教育文

化事业。4月,参与组织共学社。9月,创办讲学社。1921至1924年,先后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清华学校以及济南、南京、上海、南通、武昌、长沙等地讲学或作学术报告,发起创办文化书院。1925年9月,主持清华研究院事务。后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6年春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927年1月兼司法储才馆馆长。除续任清华学校导师外,又兼课于燕京大学。1928年患病,辞去各职。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梁启超生活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前期,正处于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动荡变化的时代。正是这样的时代,造就他成为近代中国最初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少数先进人士之一;也正是这样的时代,才显示出他那逸群不凡的智慧才干,在许多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启超在政治上非常坦诚,公开承认自己“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清代学术概论》)。但这种状况也给后人对他的评价增添了困难,以致迄今仍褒贬不一,分歧很大。不过,只要准确地理解并把握住其思想,摆脱极左思潮的羁绊,抛弃某些偏见,相信是会对他做出公允客观的评价的。

梁启超的思想虽然如流质易变,但其热爱祖国之心却始终如一,未尝稍变。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从1895年参加“公车上书”、登上政治舞台始,就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救亡图存为职志。1840年以后,由于不断遭受外国武装侵略和经济掠夺,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至1895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亡国之祸迫在眉睫。梁启超目睹“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人不自保”(《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以为“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

者也”；“国亡而人权亡，而人道之苦将不可问矣”（《爱国论》）。因此，每一个中国人都应挺身而出，抵御外侮，振兴国家。他说：“居今日而忽然不思救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血性之人也”（《中国积弱溯源论》）。他具有崇高的爱国思想，炽烈的爱国激情，“每读‘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江山坐付人’之句，未尝不扼腕而长太息也”（《亡羊录》）。他积极投身政治运动，阐发政治主张，开报馆，著文章，发表演说，建立团体，乃至进行学术研究，均不离爱国救国这一根本目的。例如，他研究历史，就是为了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新史学》）他无情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呼号国民团结一致，共同对外，“雪大耻，报大雠”（《论中国之将强》）。他坚信国家不会灭亡，只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国家就能繁荣昌盛，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把中国比作一个“少年”，正如“红日初升”，“潜龙腾渊”，其“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少年中国说》），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and 希望。他还写过有名的《爱国歌》，其中一章之词曰：“泱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行省为一家。物产腴沃甲天地，天府雄国言非夸。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裔我中华！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爱国主义犹如一条鲜明的红线贯穿着他的言行，直至晚年，仍然保持着高昂的爱国热情。他的一生，是一个爱国者的一生。他的爱国思想，鼓舞激励着许许多多忧国伤时之士走上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道路。

梁启超是一位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大师。他在传播西学、以新知识新思想启迪诱导国民方面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及其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在同时代的人中是首屈一指的。他幼

读《四书》、《五经》，受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熏陶，但他追求新知的欲望异常强烈，从不满足于所学。为了寻求新知，他主动谒见康有为，听了康有为将旧学“更端驳诂，悉举而摧陷廓清之”，他大为叹服，“决然舍去旧学”（《三十自述》），并不惜以举人身份拜秀才康有为为师。在万木草堂，他初步接触到西学。以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维新志士谭嗣同等结识，研讨西学，著《西学书目表》，作提要，介绍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达 300 种，编辑出版《西政丛书》32 种，皆为当时学习西方的切要之书。其新学之渊博，为全国青年学子之翘楚。亡命日本后，又“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夏威夷游记》）。他读了大量西方著作，思想为之一变，知识理论远较戊戌维新之前广博成熟。他认为，一个国家能在世界上立足，其国民必然有独具的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皆有独立精神；欲使国家维新，必须先维新国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新民说》）故他把启迪民智、提高国民的政治、思想、文化素质当作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头等大事来抓。早在主编《时务报》期间，他就忘我地撰述，以其出色的宣传开启民智，使海内观听为之一振，赢得极高声望，上自通都大邑，下至穷乡僻壤，无不知其大名，时人以“康梁”并称。亡命日本后，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清议报叙例》），从事更为广泛深入的启蒙事业。他大量介绍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鼓吹民权、平等、自由，甚至革命、破坏，提倡国民应该具有社会公德、权利思想，树立国家观念，敢于进取冒险，要求进步，

争取自由,培养自治能力,有独立、合群、尚武精神,懂得应尽义务,等等。他的文章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形势的发展,极富鼓动性,受到广泛热烈的欢迎,国人竞相购读,《新民丛报》每出一册,内地即大量翻印,清廷虽下令严禁而不能,人们誉其为“言论界的骄子”。黄遵宪写信给他称赞说:“《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又云在其影响之下,国内言论大变,“以公今日之学说,之政论,布之于世,有所向无前之能,有惟我独尊之概,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谓速矣。”(《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4、306页)当时的青年学子,不论政治倾向如何,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受到他的思想和文字洗礼的。他所做的思想启蒙工作,有力地促进了人们思想认识的变化,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梁启超又是一位闻名中外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家。他一贯主张进行政治改革,铲除封建专制毒根,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变封建落后的国家为资本主义先进的国家。戊戌维新时期,他发表《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文,指出亡国灭种的危险、因循守旧的危害,阐述变法维新的必要性、紧迫性,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变法主张,并时时隐发民权论;对学生,则“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清代学术概论》);在京联合各省举人上书力陈旅顺、大连不可割让俄国,变法自强;废除科举,推行经济特科,培养人才;请废八股,改试策论。东渡以后,知识领域开阔,对于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看得日益清楚,反对封建专制、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信念愈趋坚定。他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痛斥视国家为一姓之私产的

君主为“民贼”，指出：“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也。”大声疾呼：“为国民者，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他认为国民是国家的主人，有天赋的政治权利，国家的主权应该属于人民，极力主张削夺君权，大兴民权，使封建专制永远绝迹，实行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1901年，他写了《立宪法议》，阐述了民主政治代替专制政治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号召人民为实现君主立宪而奋斗。其后更倡言革命排满、破坏主义，革除封建专制政体。1903年末，他游新大陆归来，与共和“长别”，放弃了革命、破坏口号，专主政治革命，实行君主立宪。1906年，他撰写《开明专制论》，认为当前人民程度不及格，施政机关未整备，不能实行共和，也难实行君主立宪，实行君主立宪要在十至十五年以后，在这段时期，人民应劝告政府进行开明专制，要求政府实行君主立宪。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他组织立宪团体，创办杂志，发表《政治与人民》、《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宪政浅说》、《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评资政院》、《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者》、《责任内阁释义》等政论文章数十万言，阐明君主立宪的根本任务就是改变封建专制，实行英国式的民主政治，即立法权属于国会、行政权属于责任内阁、司法权独立的三权分立制度，君主“无责任”，无实权；国会议员必须由国民选举，国会权力必须完全独立，否则不得称为立宪；责任内阁只能对国会负责，不能对君主负责，否则就是破坏立宪政体，复返于专制；宪法不能钦定，应由人民协议；人民应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请愿诸自由权利；实行立宪，不能依赖政府，政府不会自愿将权力交给人民，必须依赖国民自身，结成团体，群起

向政府要求,形成国民的运动;当前应要求速开国会,将立法权抓在代表国民的国会手里。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密友徐佛苏等联络国内立宪派人士,发动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并郑重警告清政府:“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1911年5月皇族内阁成立后,他指出:国民如不能对付病国殃民的政府,国家必亡。号召国民摆正先对内后对外的次序,“急起并力而排除之”(《对外与对内》)。这些言论不仅使他成为国内立宪运动的精神领袖,有力地推动了立宪运动的深入开展,而且大大促进了人民民主主义觉悟的提高,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为辛亥革命的到来创造了条件。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一度幻想彻底改造清政府,维护君主立宪。中华民国成立,他放弃了原先的主张,公开宣布拥护共和,并主张建立良好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实行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完善法制,振兴工商业,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质,逐渐改良政治,使中华民国得以巩固强大。他热情宣传民主立宪,以美国宪法为蓝本,结合中国国情,为进步党拟订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提供大家讨论。1913年11月,大总统袁世凯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致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陷于停顿。梁启超当即见袁世凯,商谈维持国会办法。次年底,他看清了袁世凯大搞专制独裁,立即辞职。1915年春得知袁世凯有称帝野心,当即表示反对。8月,筹安会成立,袁世凯公然准备称帝,梁启超一面著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不受利诱,不畏恫吓,坚定不移地反对帝制;一面密召蔡锷赴津,商定讨袁大计。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后,梁启超也南下,策动讨袁。在护国的旗帜下,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终至败亡。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中,梁启超立了大功,为维护共和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1917年张勋复辟,梁启超又率先通电反对,并入段祺瑞讨逆军司令部参赞讨伐,再一次为维护中华民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后,他退出政治舞台,但仍念念不忘民主政治,反对少数人制定宪法,主张国民制宪,期望通过国民讨论,制定出一部真正民主的宪法,杜绝军阀和少数政客专政。总之,梁启超反对封建专制,孜孜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始终是坚定不移的,与时代潮流是一致的,所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曾引起当时革命派的批驳,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贬抑。其实,他讲的开明专制并非封建专制,“实立宪之过渡也,立宪之预备也”(《开明专制论》)。也就是做好正式立宪前的准备工作,由专制向立宪迈进的过渡时期,与其在《立宪法议》中所阐述的设想一脉相承,根本谈不到政治上的倒退。还应指出,“开明专制论”来源于日人筭克彦,不仅梁启超接受了,革命派也接受了。1905年10月,陈天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吾侪……以为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认为革命后至实行民主,中间要经过一个开明专制的预备阶段。同盟会《军政府宣言》中规定的实施政治纲领的三个顺序,第一期军法之治(三年)、第二期约法之治(六年)实质上也是开明专制,而且九年时间与梁启超的设想相去无几。故论“开明专制”在中国的发明权,应当奉献于革命派。正因为如此,革命派对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本身并未给予针锋相对的批判,倒是承认由专制向立宪过渡应该有个“开明专制”阶段。在这个问题上过多地责备

梁启超，未免失之于偏颇。

梁启超与革命派的关系向来是人们将其判为“反动”的根据之一。实际上，他与革命派的矛盾不过是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间的矛盾而已。

康有为、梁启超师徒流亡日本后，孙中山等拟联合康有为实行革命，康有为以受恩深重、惟知保教光绪复辟相拒。梁启超与其师不同，主动约见孙中山、陈少白，“陈说合作之利，彼此宜相助，勿相扼”（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1899年春康有为离开日本后，以梁启超为首的“十三太保”同革命派时相往还，一时孙、康合作之声浪轰传于东京、横滨之间，且商订联合组党计划。康有为得知，立刻派人勒令梁启超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梁启超到檀香山后的宣传，“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很快取得信任。保皇会募集捐款，争取群众，进行武装“勤王”，都需要海外侨胞大力支持。孙中山等发动革命亦然。于是，争取群众、争募捐款、争夺地盘的冲突在两派之间就势所难免了。1900年3月，梁启超致函康有为说，孙中山在“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图，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0页）此即两派矛盾的焦点。由此而引起的斗争明显属于政治派别间的仇恨，而非阶级间的仇恨。此时，梁启超还几次致函孙中山，表明联合的心意；致函陈少白，面劝康有为合作；并直接致函康有为，规谏不要存在门户之见。可见其同革命派联合确有一定诚意，并非狡诈虚伪。只是因同年6月康有为的误会，让新加坡当局将前来商谈两派合作的日人宫崎滔天拘捕时，两派合作的可能性才完全消失，而且从此形同水火。至8月自立军起事失败，秦力山等散布保皇会汇款愆期，用途不明，致使起事受阻，攻击康、梁甚力。康、梁怀疑秦力山等为革命党主使，街

恨益深,从此,梁启超与革命派的关系更加恶化。此后,梁启超不时遭到革命派攻击。1903年梁启超放弃革命和破坏口号后,革命派对他的攻击论调也随之升级,给他扣上“满奴”、“汉奸”等政治帽子。1905年《民报》出版,革命派与梁启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论争的焦点是建立什么体制的国家政权。革命派主张民主立宪,梁启超则主张君主立宪。但这两种政体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创立的民主政治形式,都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都是由资产阶级行使国家统治权,都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形态,根本宗旨没有明显的歧异。对此,革命派也直认不讳。然而,他们又认为满族是外国人,满族入侵中原是灭亡中国,因此,必须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过梁启超却主张保留皇帝,用和平手段改造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家。分歧表明,革命派对清政府的认识较梁启超深刻,斗争性坚强,反封建彻底。但毕竟是在相同宗旨前提下产生的,只有程度之差,并无本质区别。在此,需要提及一个常为论者忽视而又十分重要的论争原因,双方论争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在两派看来,谁争取的群众多,经费多,地盘大,力量强,谁就有首先战胜封建专制制度的希望,在竞争中获胜。这是个极为现实、关系到切身利益的问题,双方均直觉地感觉到它的重要性,因而竭力争夺。革命党人邹鲁说:“梁氏之文,盖足当时反革命论之代表,党人知非征服此佗,无由使革命发展也。”(《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二册 284 页)说得明确些,征服梁启超,就是为了取得人民的同情、参加和物质支援,壮大自己,削弱对方,一句话,同对方争夺民主运动领导权。梁启超也是出于同样原因起而应战的。在给康有为的信中,他说:现在革命党势力几遍全国,“我今日必须竭尽全力与之争,大举以谋进取,不然将无